

## 《新青年》宣言<sup>①</sup>

本志具体主张，从来未曾完全发表。社员各人持论，也往往不能尽同。读者诸君或不免怀疑，社会上颇因此发生误会。现当第七卷开始，敢将全体社员的公共意见，明白宣布。就是后来加入的社员，也公同担负此次宣言的责任。但“读者言论”一栏，乃为容纳社外异议而设，不在此例。

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，已经造了无穷罪恶，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。

我们相信世界各国政治上、道德上、经济上因袭的旧观念中，有许多阻碍进化而且不合情理的部分。我们想求社会进化，不得不打破“天经地义”、“自古如斯”的成见。决计一面抛弃此等旧观念，一面综合前代贤哲、当代贤哲和我们自己所想的，创造政治上、道德上、经济上的新观念，树立新时代的精神，适应新社会的环境。

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，是诚实的、进步的、积极的、自由的、平等的、创造的、美的、善的、和平的、相爱互助的、劳动而愉快的、全社会幸福的。希望那虚伪的、保守的、消极的、束缚的、阶级的、因袭的、丑的、恶的、战争的、轧轹不安的、懒惰而烦闷的、少数幸福的现象，渐渐减少，至于消灭。

我们新社会的新青年，当然尊重劳动；但应该随各人的才能兴趣，把劳动放在自由愉快艺术美化的地位，不应该把一件神圣

的东西当做维持衣食的条件。

我们相信人类道德的进步，应该扩张到本能（即侵略性及占有心）以上的生活；所以对于世界上各种民族，都应该表示友爱互助的情谊。但是侵略主义、占有主义的军阀财阀，不得不以敌意相待。

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，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，绝对断绝关系。

我们虽不迷信政治万能，但承认政治是一种重要的公共生活。而且相信真的民主政治，必会把政权分配到人民全体，就是有限制，也是拿有无职业做标准，不拿有无财产做标准；这种政治，确是造成新时代一种必经的过程，发展新社会一种有用的工具。至于政党，我们也承认是运用政治应有的方法；但对于一切拥护少数人私利或一阶级利益，眼中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，永远不忍加入。

我们相信政治、道德、科学、艺术、宗教、教育，都应该以现在及将来社会生活进步的实际需要为中心。

我们因为要创造新时代新社会生活进步所需要的文学道德，便不得不抛弃因袭的文学道德中不适用的部分。

我们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，破除迷信妄想，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。

我们相信尊重女子的人格和权利，已经是现在社会生活进步的实际需要；并且希望他们个人自己对于社会责任有彻底的觉悟。

我们因为要实验我们的主张，森严我们的壁垒，宁欢迎有意识有信仰的反对，不欢迎无意识无信仰的随声附和。但反对的方面没有充分理由说服我们以前，我们理当大胆宣传我们的主张，出于决断的态度；不取乡愿的、紊乱是非的、助长惰性的、阻碍

进化的、没有自己立脚地的调和论调；不取虚无的、不着边际的、没有信仰的、没有主张的、超实际的、无结果的绝对怀疑主义。

①原载《新青年》第7卷第1期，1919年12月1日。《新青年》原名《青年杂志》，1915年9月15日创刊于上海，其《社告》如下：

- “一、国势陵夷，道衰学弊。后来责任，端在青年。本志之作，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。
- 二、今后时会，一举一措，皆有世界关系。我国青年，虽处蛰伏研求之时，然不可不放眼世界。本志于各国事情学术思潮尽心灌输，可备攻错。
- 三、本志以平易之文，说高尚之理。凡学术事情足以发扬青年志趣者，竭力阐述，冀青年诸君子研习科学之余，得精神上之援助。
- 四、本志执笔诸君，皆一时名彦，然不自拘限。社外撰述，尤极欢迎。海内鸿硕，倘有佳作见惠，无任期禱。
- 五、本志特辟通信一门，以为质析疑难发舒意见之用。凡青年诸君子对于物情学理有所怀疑，或有所阐发，皆可直缄惠示。本志当尽其所知，用以奉答，庶可启发心思，增益神志。”

《青年杂志》的主编为陈独秀，主要撰稿人有高一涵、刘叔雅等人。这时期已经提出科学和民主的口号，但影响不大。1916年9月第2卷第1号起改名《新青年》。同年年底，陈独秀应蔡元培之约到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，《新青年》移北京出版。从1918年1月第4卷开始，宣布“所有撰译，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，不另购稿”，成为同人杂志性质。这时的撰稿人陆续增加了李大钊、吴虞、钱玄同、陶孟和、胡适、沈尹默、刘半农等。鲁迅也从第4卷起开始写稿。1919年起成立编辑委员会，宣布由陈独秀、钱玄同、高一涵、胡适、李大钊、沈尹默轮流编辑。实际上编委会的形式并不固定，编委会的成员也并不限于上述六人，鲁迅也曾参加编委会。

《新青年》从1915年开始出版，到1926年止，前后存在十年以上。

## 《新青年》之新宣言<sup>①</sup>

“我将创造成整个儿的世界，  
又广大，又簇新；请几万万人  
终身同居住，免得横受危害，  
只希望我自己的自由劳动……  
我终看得见奇伟的光辉内  
那自由的平民，自由的世界。

那时我才说唉，‘一瞬’，  
你真佳妙！且广延，且相继！  
我所留的痕迹，必定  
几千百年永久也不磨灭。”

歌德之《浮士德》（Goethe, “Faust”）

《新青年》杂志是中国革命的产儿。中国旧社会崩坏的时候，正是《新青年》的诞辰。于此崩坏的过程中，《新青年》乃不得不成为革新思想的代表，向着千万重层层压迫中国劳动平民的旧文化，开始第一次的总攻击。中国的旧社会、旧文化是什么？是宗法社会的文化，装满着一大堆的礼教伦常，固守着无量数的文章词赋；礼教伦常其实是束缚人性的利器，文章词赋也其实是贵族淫昏的粉饰。1911年十月十日的中国革命，不过是宗法式的统一国家及奴才制的满清宫廷败落瓦解之表象而已。至于一切教会式的儒士阶级的思想，经院派的诵咒画符的教育，几乎丝毫没

有受伤。如何能见什么自由平等！可是中国的大门上，却已挂着“民国”招牌呢。当时社会思想处于如此畸形的状态之中，独有《新青年》首先大声疾呼：反对孔教，反对伦常，反对男尊女卑的谬论，反对矫揉做作的文言！反对一切宗法社会的思想，才为“革命的中国”露出真面目，为中国的社会思想放出有史以来绝未曾有的奇彩。五四运动以来，更足见中国社会之现实生活确在经历剧烈的变迁过程，确有行向真正革命的趋势，所以（新青年）的精神能波及于全中国，能弥漫于全社会。《新青年》乃不期然而然成为中国真革命思想之先趋。中国现时的旧社会，不但是宗法社会而已，他已落于世界资本主义的虎口，与世界无产阶级同其命运。因此，中国黑暗反动的旧势力，凭借世界帝国主义要永久作威作福，中国资产阶级自然依赖世界资本主义而时时力谋妥协。于是中国的真革命，乃独有劳动阶级方能负担此等伟大使命。中国社会中近年来已有无数事实，足以证明此种现象——即使资产阶级的革命亦非劳动阶级为之指导，不能成就；何况资产阶级其势必半途而辍，失节自卖。真正的解放中国，终究是劳动阶级的事业；所以《新青年》的职志，要与中国社会思想以正确的指导，要与中国劳动平民以智识的武器。《新青年》乃不得不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。

《新青年》自诞生以来，先向宗法社会、军阀制度作战，革命性的表示非常明显。继因社会现实生活的教训，于“革命”的观念，得有更切实的了解，——知道非劳动阶级不能革命，——所以《新青年》早已成无产阶级的思想机关，不但将与宗法社会的思想行剧激的争斗，并且对于资产阶级的思想同时攻击。本来要解放中国社会，必须力除种种障碍：——那宗法社会的专制主义，笼统的头脑，反对科学，迷信，固然是革命的障碍；而资产阶级的市侩主义，琐屑的对付，谬解科学，“浪漫”，亦是革命的

大障碍。因此种种，《新青年》孤军独战，势不均，力不敌，——军阀的统治，世界帝国主义的统治，如此的残酷，学术思想都在其垄断贿赂威迫利诱之下，无产阶级的思想机关既不能充分积聚人才能力之可能，又内受军阀的摧残，外受“文明西洋人”的压迫，所以困顿竭蹶，每月不能如期出世，出世的又不能每期材料丰富。然而凡是中国社会思想的先进代表必定对于（新青年）表无限的同情，必定尽力赞助；《新青年》亦决不畏难而退，决不遇威而屈。现在既能稍稍集合能力，务期不负他的重任，所以在可能的范围内，重行整顿一番，再作一次郑重的宣言。

《新青年》当为社会科学的杂志。《新青年》之有革命性并不是因为他格外喜欢革命“爱说激烈话”，——而是因为现代社会已有解决社会问题之物质基础，所以发生社会科学，根据于此科学的客观性，研究考察而知革命之不可免；况且无产阶级在社会关系之中，自然处于革命领袖的地位，所以无产阶级的思想机关，不期然而然突现极显明的革命色彩。中国古旧的宗法社会之中，一切思想学术非常幼稚，同时社会演化却已至极复杂的形式，——世界帝国主义，突然渗入中国的社会生活，弄得现时一切社会现象繁杂淆乱，初看起来，似乎绝无规律，中国人的简单头脑遇见此种难题尤其莫明其妙，于是只好假清高唱几句“否认科学”的“高调”。独有革命的无产阶级，能勇猛精进，不怕“打开天窗说亮话”，应当竭尽全力以指导中国社会思想之正常轨道，——研究社会科学；当严格的科学方法研究一切，自哲学以至于文学，作根本上考察，综观社会现象之公律，而求结论，况且无产阶级，不能像垂死的旧社会苟安任运，应当积极斗争，所以特别需要社会科学的根本知识，方能明察现实的社会现象，求得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。凡是中国社会的新活力，真为劳动平民自由正义而奋斗的青年，不宜猥猥琐琐滞于目前零碎的现象，或

者因此而灰心丧志，或者因此而敷衍涂砌，自以为高洁，或自夸为解决问题；更不宜好高骛远，盲目的爱新奇，只知求所谓高深邃远的学问，以至于厌恶实际运动。《新青年》必定要由浅入深，有系统、有规划的应此中国社会思想的急需。——“社会现象复杂得很呢，单是几个‘新术语’尚且要详加？绎，然后能令真正虚心诚意的革命青年及劳动平民知道‘社会’是个什么东西！”

《新青年》当研究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状况。研究社会科学，本是为解释现实的社会现状，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，分析现实的社会运动；真正的科学，决不是玄虚的理想。中国新思想的幼稚时期已过。现在再也不用搬出种种现成的模型，勉强要中国照着他捏。其实“中国式的新乌托邦家”不但不详悉他自己所荐举的模型，而且也不明了中国社会，正因不了解社会科学的方法，不能综观实际现象而取客观的公律，所以不是泥于太具体的事实：说到中国政治，头脑里只有张曹吴孙几个大姓大名，就是力避现实，逃于玄想；说到经济改造，满嘴的消费、生产、分配等类的外国新名词，不会应用于实际。《新青年》现在也要力求避免此等弊病，当尽其所有区区的力量，用社会科学的方法，试解剖中国的政治经济，讨论实际运动。

《新青年》当表现社会思想之渊源，兴起革命情绪的观感。社会科学本是要确定社会意识，兴奋社会情感，以助受压迫、被剥削的平民实际运动之进行。所以对于一般的思想及情绪之流动，都不得不加以正确的分析及映照。一切文学艺术思想之流派，本没有抽象的“好”与“坏”，在此中国社会忙于迎新送旧之时，《新青年》应当分析此等流派之渊源，指出社会情绪变动的根由，方能令一般的意识渐渐明晰，不至于终陷于那混沌颠顶等于飞蛾投火的景象；再则现时中国文学思想，——资产阶级的“诗思”往往有颓废派的倾向 此旧社会的反映 与劳动阶级的

心声同时并呈，很可以排比并观，考察其中的动象；亦可以借外国文学相当的各时期之社会的侧影，旁衬出此中的因果。却尤其要收集革命的文学作品，与中国麻木不仁的社会以悲壮庄严的兴感。

《新青年》当开广中国社会之世界观，综合分析世界的社会现象。社会科学本无国界；仅因历史的关系，造成相隔离的文化单位，所以觉得各国有各国的“国粹”，其实不过是社会的幻觉，泥滞于形式上的差别。中国受文化上封锁三千多年，如今正是滚入国际舞台的时候，非亟亟开豁世界观不可。况且无产阶级的斗争本来就是国际的，尤其不可以不知道各国劳工革命运动的经验。因此《新青年》当注意于社会科学之世界范围中的材料，研究各国无产阶级运动之过去与现在，使中国得有所借鉴。从最反动的日本至赤色的苏维埃俄国，都应当研究。

《新青年》当为改造社会的真理而与各种社会思想的流派辩论。社会科学，因研究之者处于所研究的对象之中间，其客观的真理比自然科学更容易混淆。因此，人既生于社会之中，人的思想就不能没有反映社会中阶级利益的痕迹；于是社会科学中之各流派，往往各具阶级性，比自然科学中更加显著。《新青年》是无产阶级思想机关。无产阶级于现代社会中，对于现存制度自取最对抗的态度；所以他的观察始终是比较最客观的。何况《新青年》在世界无产阶级的文字机关中，算是最幼稚的，未必有充分健全的精力，足以为绝对正确的观察。有此两因，都足以令《新青年》不能辞却与各方面的辩论：一则以指出守旧各派纯主观的谬误，一则以求真诚讨论后之更正确的结论。于辩论之中，方能明白何者为无产阶级的科学结论，何者为更正确、更切合于事实的理论。总之，为改造社会而求真理。

中国幼稚的无产阶级，仅仅有最小限度的力量，能用到《新

青年》上来，令他继续旧时（新青年）之中国“思想革命”的事业，行彻底的坚决斗争，以颠覆一切旧思想，引导实际行动，帮助实际行动，以解放中国，解放全人类，消灭一切精神上、物质上的奴隶制度，达最终的目的：共产大同。《新青年》虽然力弱，必定尽力担负此重大责任，谨再郑重宣告于中国社会：

《新青年》曾为中国真革命思想的先驱，

《新青年》今更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。

\* \* \*

《新青年》既为中国社会思想的先驱，如今更切实于社会的研究，以求知识上的武器，助平民劳动界实际运动之进行。而现代最先进的社会科学派别，最与实际的世界革命运动有密切关系的，就是共产国际。所以《新青年》新整顿之时，特以此“国际共产号”为其第一期。

原载《新青年季刊》第1期，1923年6月15日，本期为《共产国际号》，篇首刊有《国际歌》及乐谱。这时《新青年》已成为中共中央理论性机关刊物，季刊出了四期。1925年4月起改为不定期刊，1926年7月停刊；不定期刊共出5期。又，本期刊有《本志启事》：“本志自与读者诸君相见以来，与种种磨难战，死而复苏者数次；去年以来，又以政治的经济的两重压迫，未能继续出版，同人对于爱读诸君，极为抱歉。兹复重整旗鼓为最后之奋斗，并以节省人力财力及精审内容计，改为季刊，数量上虽云锐减，质量上誓当猛增，补前此衍期之过。其定阅而未寄满者，一概按册补齐，以酬雅意，并此声明。”

## 涉及《新青年》分化的几封信<sup>①</sup>

### 一 陈独秀致李大钊等信

守常、玄同、适之、孟和、一涵、慰慈、豫才、启明、抚五诸君：

弟日内须赴广州，此间编辑事务已请陈望道先生办理，另外新加入编辑部者，为沈雁冰、李达、李汉俊三人。弟在此月用编辑部薪水百元，到粤后如有收入，此款即归望道先生用，因为编辑事务很多，望道境遇又不佳，不支薪水似乎不好。望道先生已移住编辑部，以后来稿请寄编辑部陈望道先生收不误。四号报已出版，五号报收稿在即，甚盼一涵、孟和、玄同诸兄能有文章寄来（因为你们三位久无文章来了）。

弟独秀（辑注者按，此信无发信日子，估计当在下面第二封信之前）

请阅后在自己名字上打一个圈子，并请转寄给没有圈子的人。适

昨日知《新青年》已不准邮寄。适

## 二 陈独秀的信

适之、一涵兄：弟今晚即上船赴粤。此间事都已布置了当，《新青年》编辑部事有陈望道君可负责，发行部事有苏新甫君可负责。《新青年》色彩过于鲜明，弟近亦不以为然，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容，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，但如此办法，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。近几册内容稍稍与前不同，京中同人来文太少，也是一个重大的原因，请二兄切实向京中同人催寄文章。

一涵兄与慰慈兄译的《工业自治》，已成功没有？译成时望寄社中，前成一段已检存望道君处。（望道君已移住渔阳里二号。）

南方颇传适之兄与孟和兄与研究系接近，且有恶评，此次高师事，南方对孟和颇冷淡，也就是这个原因，我盼望诸君宜注意此事，余言候到粤再谈。弟独秀（民国九年十二月）十六夜。

## 三 胡适的信

仲甫：十六夜你给一涵的信，不知何故，到廿七夜始到。

《新青年》“色彩过于鲜明”兄言“近亦不以为然”，但此是已成之事实，今虽有意抹淡，似亦非易事。北京同人抹淡的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。现在想来，只有三个办法：

1. 听《新青年》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，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，篇幅不求多，而材料必求精。我秋间久有此

意，因病不能作计划，故不曾对朋友说。

2. 若要《新青年》“改变内容”，非恢复我们“不谈政治”的戒约，不能做到。但此时上海同人似不便做此一着，兄似更不便，因为不愿示人以弱。但北京同人正不妨如此宣言。故我主张趁兄离沪的机会，将《新青年》编辑的事，自九卷一号移到北京来。由北京同人于九卷一号内发表一个新宣言，略根据七卷一号的宣言，而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，声明不谈政治。

孟和说，《新青年》既被邮局停寄，何不暂时停办，此是第三办法。但此法与（新青年）社的营业似有妨碍，故不如前两法。

总之，此问题现在确有解决之必要。望兄质直答我，并望原谅我的质直说话。

此信一涵、慰慈见过。守常、孟和、玄同三人知道此信的内容。他们对于前两条办法，都赞成，以为都可行。余人我明天通知。适。

抚五看过。说“深表赞同”。适。

此信我另抄一份，寄给上海编辑部看。适。

## 四 胡适的信

守常、豫才、玄同、孟和、慰慈、启明、抚五、一涵诸位：年底的时候，独秀有信寄给一涵与我，信中有云：“《新青年》色彩过于鲜明，弟近来亦不以为然，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变内容，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。但似此办法，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。近几册内容稍稍与前不同，京中同人来文太少，也是一个重大的原因。”（此信日子为“十六夜”，但至十二月二十七夜始

到。)我因答此信，曾提出两条办法，(原信附上)我自信此两条皆无足以引起独秀误会之处，不意独秀答书颇多误解。守常兄已将此书传观，我至今日始见之，未及加以解释，恐误会更深，故附加一函，并附独秀与孟和书一份，再请你们各位一看。

第一：原函的第三条“停办”办法，我本已声明不用，可不必谈。

第二：第二条办法，豫才兄与启明兄皆主张不必声明不谈政治，孟和兄亦有此意。我于第二次与独秀信中曾补叙入。此条含两层：1. 移回北京，2. 移回北京而宣言不谈政治。独秀对于后者似太生气，我很愿意取消“宣言不谈政治”之说，单提出“移回北京编辑”一法。理由是：《新青年》在北京编辑或可以多逼迫北京同人做点文章。否则独秀在上海时尚不易催稿，何况此时在素不相识的人的手里呢？岂非与独秀临行时的希望——“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”——相背吗？

第三：独秀对于第一办法——另办一杂志——也有一层大误解。他以为这个提议是反对他个人。我并不反对他个人，亦不反对《新青年》。不过我认为今日有一个文学哲学的杂志的必要，今《新青年》差不多成了《Soviet Russia》的汉译本，故我想另创一个专关学术艺文的杂志。今独秀既如此生气，并且认为反对他个人的表示，我很愿意取消此议，专提出“移回北京编辑”一个办法。

总之，我并不反对独秀，——你们看他给孟和的信，便知他动了一点感情，故轻信一种极可笑的谣言。——我也不反对《新青年》，我盼望《新青年》“稍改变内容，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”(独秀函中语)。我为了这个希望，现在提出一条办法：就是和独秀商量，把《新青年》移到北京编辑。

这个提议，我认为有解决的必要。因为我仔细一想，若不先

解决此问题，我们决不便另起炉灶，另创一杂志。若此问题不先解决，我们便办起新杂志来了，表面上与事实上确是都很像与独秀反对。表面上外人定如此揣测。事实上，老实说，我们这一班人决不够办两个杂志，独秀虽说“此事与《新青年》无关”，然岂真无关吗？故我希望我们先解决这个问题。若京沪粤三处的编辑部同人的多数主张把编辑的事移归北京，则“改变内容”，“仍趋重哲学文学”（皆独秀函中语），一个公共目的，似比较的更有把握，我们又何必另起炉灶，自取分裂的讥评呢？

诸位的意见如何？千万请老实批评我的意见，并请对于此议下一个表决。胡适上。十一、廿二。

慰慈赞成此议。适。

一涵赞成此议。适。

赞成移回北京。如实不能则停刊，万不可分为两种杂志，致破坏《新青年》精神之团结。陶孟和。

赞成孟和兄的意见。王抚之。

我还是主张从前的第一条办法。但如果不致“破坏《新青年》精神之团结”，我对于改归北京编辑之议亦不反对，而绝对的不赞成停办，因停办比分裂还不好。守常。

后来守常也取消此议，改主移京编辑之说。适注。

赞成北京编辑。但我看现在《新青年》的趋势是趋于分裂的，不容易勉强调和统一。无论用第一、第二条办法，结果还是一样，所以索性任他分裂，照第一条做或者倒还好一点。作人代。

与上条一样，但不必争《新青年》这一个名目。树。

玄同的意见，和周氏弟兄差不多，觉得还是分裂为两个杂志的好。一定要这边拉过来，那边拉过去，拉到结果，两败俱伤，不但无谓，且使外人误会，以为（新青年）同人主张“统一思

想”，这是最丢脸的事。孟和兄主张停办，我却和守常兄一样，也是绝对的不赞成。我以为我们对于仲甫兄的友谊，今昔一样，本未丝毫受伤。但（新青年）这个团体，本是自由组合的，即此其中有人彼此意见相左，也只有照“临时退席”的办法，断不可提出解散的话。极而言之，即使大家对于仲甫兄感情真坏极了，友谊也断绝了，只有他一个人还是要办下去，我们也不能要他停办。至于《新青年》精神之能团结与否，这是要看各个人的实际思想如何来断定，断不在乎《新青年》三个字的金字招牌！玄同附注。一九二一、一、廿六。

## 五 鲁迅的信

适之先生：寄给独秀的信，启孟以为照第二个办法最好。他现在生病，医生不许他写字，所以由我代为声明。

我的意思以为三个都可以。但如北京同仁一定要办，便可以用上两办法，而第二个办法更为顺当。至于发表新宣言，说明不谈政治，我却以为不必。这固然小半在“不愿示人以弱”，其实则凡《新青年》同仁所作的作品，无论如何宣言，官场总是头痛，不会优容的。此后只要学术思想艺文的气息浓厚起来，——我所知道的几个读者极希望《新青年》如此——就好了。树（一九二一年）一月三日。

## 六 李大钊的信

适之兄：信已传到我手。我因为昨天想到你那里去，好带给

你看，故未传给他人。不意那位办《北京晓（晨？）报》的方先生到辛白先生处邀我去谈，所以未到你那里去。前天见了玄同，他说此事只好照你那第一条办法，但关于研究系谣言问题，我们要共同给仲甫写一信，去辩明此事。现在我们大学一班人，好像一个处女的地位，交通、研究、政学各系都想勾引我们，勾引不动就给我们造谣，还有那国民系看见我们为这些系所垂涎，便不免引起点醋意，真正讨嫌！起明、豫材的意见，也大致赞成第一办法，但希望减少点特别色彩。我三两日得了工夫，一定去看你，好和你谈谈。守常。

## 七 陈独秀的信

适之兄：六日来信收到了。我当时不赞成《新青年》移北京，老实说是因为近来大学空气不大好，现在《新青年》已被封禁，非移粤不能出版，移京已不成问题了。你们另外办一个报，我十分赞成，因为中国好报太少，你们做出来的东西总不差，但我却没有工夫帮助文章。而且在北京出版，我也不宜做文章。我是一时不能回上海了。你劝我对于朋友不要太多疑，我承认是我应该时常不可忘却的忠告，但我总是时时提心吊胆恐怕我的好朋友书呆子为政客所利用。我仍希望你非候病十分好了，不可上课、做文章，而且很想你来广东一游。弟独秀白二月十五日

录自（胡适来往书信选）等书。按：五四运动以后，《新青年》内部分化，到了第8卷第1期《新青年》成为上海共产党小组的机关报以后，分化加剧。当时《新

青年》刊登启事说：“本志自8卷1号起，由编辑部同人自行组织‘新青年社’，直接办理编辑印刷发行一切事务”。这个“新青年社”设在当时上海法租界，除出版《新青年》月刊以外，还出版《劳动界》、《伙友》等通俗的工人刊物。

《新青年》分化以后，由胡适等人创办了《努力》周刊。